

俄国早期来华的重要使臣 斯帕法里其人其事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黄定天

斯帕法里系俄国早期来华的重要使臣之一，但他并非俄罗斯人，他的祖先是希腊人，其出生地曾是罗马尼亚公国的一部分。斯帕法里少年时游学于奥斯曼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的帕多瓦，青年时混迹于欧洲几国的宫廷。到俄国外务衙门供职后被沙皇选中率团出使中国，因而在早期中俄关系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他返回莫斯科后，向外务衙门呈交了四部关于中国的重要书稿，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以各种文字广为流传，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从摩尔达维亚到莫斯科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①，1625年^②出生于摩尔达维

① 关于斯帕法里的名字用法不一，主要有以下三种：尼果翰·加甫里洛维奇·米列斯库（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尼古拉·班蒂什-卡姆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980年莫斯科出版了一部Д·Т·乌尔苏拉的专著，其中称之为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米列斯库·斯帕法里。其实上述三种称谓均无错误，只是比较混乱。米列斯库是其父加夫里尔根据其家族领地的称谓（米列斯库）给他的命名。他在宫廷供职后被封为“斯帕法里”（也有译作“斯巴达尔”或“斯帕达”），“斯帕法里”的罗马尼亚语含义是“带剑卫士”（一说来自意大利语“利剑、佩剑”），从此“斯帕法里”即成为他的译名。在离开摩尔达维亚之后，他便不再使用米列斯库一名，而一直到死都使用“斯帕法里”这个名字。所以称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比较合适。

② 关于斯帕法里的出生年代，也有两种说法。摩尔达维亚И·涅库尔切编年史提到，斯帕法里出生于1625年（见米亚斯尼科夫、塔拉索夫《斯帕法里的著作与时代》，（转下页注）

亚^①瓦斯卢伊乌区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名叫加夫里尔，其祖先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希腊人，从南摩里亚（拉科尼亚）迁居于摩尔达维亚，其家族通过与当地吉卡和杜卡两个家族通婚取得了贵族的地位。

斯帕法里幼年就学于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里是地中海东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一座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历史名城。斯帕法里在君士坦丁堡希腊总主教学校受到多方面的正规教育，曾在加布列尔·弗拉西指导下进修。弗拉西是位学识渊博的人，后来任纳夫帕克托斯和阿尔塔大主教。斯帕法里天资颇高，又勤奋好学，不久就掌握了古典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又学习了神学、哲学、文学和历史。后来斯帕法里到意大利的帕多瓦，在那里学会了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并掌握了自然科学和数学原理。年轻的斯帕法里由于学识广博而又通晓多种语言，因而在摩尔达维亚崭露头角。

斯帕法里学成之后，应召回到自己的祖国，很快就担任了摩尔达维亚大公乔治·斯特凡的秘书，后来又任乔治·斯特凡的继承人乔治·吉卡的秘书。这期间，斯帕法里曾被乔治·吉卡委任为一支由1000人组成的军队的指挥官，应奥斯曼帝国的要求去特兰斯瓦尼亚执行任务。乔治·吉卡让位给斯特法尼茨后，斯帕法里继续担任秘书一职，并且经常和斯特法尼茨一同出巡，一同进餐，一同打牌，深受斯特法尼茨的器重。然而，斯帕法里并不甘心久居人下，图谋取而代之。他给比萨拉比亚^②的统治者送去一封藏在空心手杖中的信，表露了此意，但那位统治者并不打算支持他，却把这封信交给了斯特法尼茨。蒙在鼓里的斯特法尼茨为此感到震怒，立即派人

（接上页注②）载《远东问题》1985年第2期）。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提到，“据地方当局称，出生年代在1625年前后”（见中译本第1258页），与И. 涅库尔切编年史一致。另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出生于1636年（见索罗维约夫、基别里《西伯利亚与中国》，基什涅夫，摩尔达维亚国立地图出版社，1960，第4页）。这种说法可能是当1676年斯帕法里谒见康熙帝时，康熙帝通过耶稣会士南怀仁询问他的年龄，他回答说40岁，由此推测而来。应当说1625年这个说法比较可信，因为斯帕法里在君士坦丁堡希腊总主教学校学习时的主要老师加布列尔·弗拉西于1618~1632年和稍后时期在该校任教，如果斯帕法里出生于1636年则不会从师于加夫里尔·弗拉西了。另外，斯帕法里在1653年前已完成学业，在摩尔达维亚公侯身边担任要职，如果生于1636年这时才17岁，担任要职的可能性不大。当时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斯帕法里不愿向清朝皇帝说出自己的真实年龄，因而给后人造成误解。

①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1940年由比萨拉比亚的大部分和乌克兰的小片地区组成，历史上曾是罗马尼亚公国的一部分。

② 该地区14世纪是摩尔多瓦公国（后与瓦拉几亚公国合并，改称罗马尼亚）的一部分，16世纪起受奥斯曼帝国统治，1128年被沙俄吞并，1918年归还罗马尼亚，1920年英、法、意、日等国在巴黎同罗马尼亚签订条约，承认罗马尼亚对该地区的主权。1940年又并入苏联。

用自己的一把短剑割掉了这位图谋篡位者的鼻子。^① 斯帕法里受此侮辱性的刑罚，无法在摩尔达维亚立足，只得投奔他从前的主人，现任瓦拉几亚^②公侯的乔治·吉卡。乔治·吉卡欣赏他的才华，收留并重用他，委派他为驻君士坦丁堡代表。

1644年，奥斯曼帝国与波兰之间发生战争，乔治·吉卡决定站在波兰一边反对奥斯曼帝国，想借此机会将瓦拉几亚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当然，这对乔治·吉卡来说也是铤而走险的事。此时，乔治·吉卡的政敌谢尔巴克·坎塔库增到处游说，怂恿乔治·吉卡的部下背叛其主，企图取代瓦拉几亚大公的地位，斯帕法里便在坎塔库增的授意下背叛其主。结果，瓦拉几亚并未获得解放，乔治·吉卡当然也被废黜了，而坎塔库增也未能如愿。斯帕法里背叛了旧主，又未得到新任大公的信赖，作为已废公侯驻奥斯曼帝国京城的代表自然无法待下去，只好走上了流亡之路。

斯帕法里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勃兰登堡^③，在那里受到了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盛情接待。他在那里一住就是好几年，由于未曾任职，所以主要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上。可惜好景不长，斯帕法里失去了威廉的宠信，只好另走他乡，来到什切青。他最初的主人乔治·斯特凡正在那里过着流亡生涯，很快他就被乔治·斯特凡委任为驻瑞典的外交代表而奔赴斯德哥尔摩。

在斯德哥尔摩，斯帕法里结识了法国驻瑞典大使阿尔诺·戴·波旁，此人同土耳其保皇的冉森教派关系密切。1667年7月，斯帕法里携带着戴·波旁和卡尔九世的信到巴黎谒见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此行的目的在于游说法国国王，企图让法国政府出面说服奥斯曼帝国恢复乔治·斯特凡在摩尔达维亚的大公爵位，还企望说服法国国王，建立一个反奥斯曼帝国的同盟。然而，斯帕法里此行并不顺利，西方各国对瓦解奥斯曼帝国一事并不感兴趣，他只好于翌年返回故乡。不久，他的主人乔治·斯特凡死在了什切青，斯帕法里也不必再为他效力了。1671年，斯帕法里又来到君士坦丁堡，此时他无依无靠，又无所事事，但很快得到了耶路撒冷总主教多

① 在古代拜占庭，割鼻是一种很平常的刑罚，并不是将整个鼻子割掉，而是为受罚者留下不能消除的印记。斯帕法里所受的鼻刑可能属于这一类。也有说斯帕法里被割去了鼻孔之间的软骨。后来，当斯帕法里在勃兰登堡居住时，一位德国医生为他做了一次成功的手术，使他的鼻子恢复了原状。

② 该公国于14世纪初建成，属匈牙利。1411年沦为奥斯曼帝国的属国，16世纪起完全为奥斯曼帝国所统治。经过长期斗争，于1829年取得自治。后与摩尔多瓦公国合并，形成多瑙公国，1861年改称罗马尼亚公国。今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

③ 当时属普鲁士王国。在易北河支流哈韦尔河畔，现德国境内。

西费伊的赏识。多西费伊与俄国上层联系密切，深知斯帕法里年纪虽轻，却通晓数种东、西方语言，又出入过欧洲几个国家的宫廷，颇有外交手段。恰巧，俄国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写信给多西费伊，希望他向俄国推荐学识渊博、通晓多种语言而又信仰东正教的人才，斯帕法里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1671年3月1日，斯帕法里携带着多西费伊总主教赞不绝口的荐书从亚得利亚那堡出发，途经匈牙利和波兰前往俄国。他在华沙逗留了三个星期，受到波兰国王的接见。5月28日，斯帕法里踏上俄国地界，从此，俄国成为他的第二个祖国。莫斯科督军霍万斯基在斯摩棱斯克接见了，了解并向沙皇禀报了他的情况。1671年12月14日，沙皇降旨，命尼·加·斯帕法里到外务衙门“终身”服务，任命他为希腊语、拉丁语和沃洛什语（即摩尔达维亚语）翻译，斯帕法里欣然宣誓就职。在外务衙门，他被列入莫斯科贵族的名册，这对于一个异国翻译来说是最高荣誉了。斯帕法里不但能翻译，而且经常编书，工作又勤奋，特别是他对沙皇和东正教极其忠诚，所以很快得到掌管外务衙门的重臣、大贵族A. 马特维耶夫的青睞。尽管他是翻译中最年轻的，但很快就被提升为希腊语、拉丁语等几种语言的首席翻译，薪水也是翻译中最高的，年薪100卢布，不久又增长到132卢布，每天的膳食费还不计算在内。

二 受沙皇之命出使中国

1673年2月4日，沙皇政府决定向中国派遣外交使团，这是俄国派往中国的第四个外交使团。经过A. 马特维耶夫的推荐，斯帕法里被任命为使团团团长。一名外务衙门的翻译，又是异国人，被委此重任，不能不说是一种殊荣，而这次出使也成为斯帕法里一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

出使的准备工作足足进行了两年，斯帕法里调阅了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所保存的有关中国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从前几次到过中国的使团及军役人员、商人那里征集来的。他研究了通往中国的各条道路，搜集到有关中国的书籍、辞典和图像，又领取了等高仪、罗盘仪等用具。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外务衙门于1675年2月28日向斯帕法里下达了训令。这个训令长达万余言，内容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其要点是：探明俄国通往中国最便捷的路线；考察中国的国情、军备、民俗；探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及通商贸易关系的可能性等。

1675年3月3日，斯帕法里率领着颇具规模的使团离开莫斯科前往中

国。他的主要随员包括：两名贵族——希腊人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格列恰宁和阿拉伯血统的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利万诺夫，两名外务衙门的书吏——尼基福尔·韦纽科夫和伊万·法沃罗夫，两名首饰和药材专家——希腊人斯皮里顿·叶夫斯塔菲耶夫和伊万·尤里耶夫。此外，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米洛瓦诺夫被派遣先赴北京联系。使团还携带了约值2700卢布的貂皮、黑狐皮、呢绒、珊瑚串珠、镜子、钟表以及琥珀等物品，作为馈赠礼品和贸易用。使团经近一个月的跋涉来到托博尔斯克，在那里又配备了6名当地的军役贵族、6名驯隼人员、1名神甫、1名通译及40名哥萨克步兵和骑兵，使这个使团成为一支150余人的庞大队伍。9月5日，使团抵达伊尔库茨克。在那里，斯帕法里特别会见了1667年叛国投俄的鄂温克王公根特木尔。清政府曾多次向俄国提出引渡根特木尔，但均遭无理拒绝，这时斯帕法里再次向根特木尔保证，决不会把他交还清政府。

1676年1月26日，使团来到中国北方重镇、嫩江畔的卜魁村（齐齐哈尔）。清政府获悉使团入境后，特派礼部侍郎马喇前往卜魁迎接。3月12日，马喇与斯帕法里在卜魁首次会晤，双方就两国关系和递交国书的程序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谈判。马喇就1670年康熙帝致沙皇国书中要求俄国停止侵略中国领土并交还根特木尔两事询问斯帕法里，斯帕法里对清政府提出的这两项正当要求无言以对，但他却大施外交手腕，诡称由于文字的隔阂，至今还不知道国书内容。马喇反驳他说，上述国书内容已于当时告知使臣米洛瓦诺夫和尼布楚督军阿尔申斯基。斯帕法里却狡辩说，阿尔申斯基因未奉沙皇谕旨就收下了清朝皇帝的咨文和擅自进行外交往来，已失宠被黜，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过，他向莫斯科隐瞒了根特木尔一事。其实，斯帕法里明知清政府曾多次提出引渡根特木尔，也清楚沙皇根本不准备交还，就在不久前，在伊尔库茨克他还当面许诺根特木尔不把他交还清政府。这时他把尼布楚督军阿尔申斯基的退休说成是被黜，并谎称不知根特木尔一事，把全部责任推到了阿尔申斯基身上。双方在当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预备性谈判，斯帕法里充分施展了他的外交手段，避重就轻，软磨硬泡，使马喇无计可施。

1676年4月17日，经清政府同意，俄国外交使团在清朝官员的护送下，从卜魁前往北京。斯帕法里一行经松辽平原及热河等地，于5月15日抵达北京。在京期间，斯帕法里坚持不肯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先将国书送礼部翻译，然后呈皇帝阅，而要直接递交康熙帝。双方就此问题又僵持了近一个月，无奈，清政府只得采取妥协办法。6月5日，在午门特设一张铺着黄绸的御案，斯帕法里把国书放于此案上，完成了递交国书的仪式，实

际上达到了他的要求。6月8日，斯帕法里按照出使前沙皇政府给他的训令，又向清政府递交了一份用拉丁文书写的照会。斯帕法里根据自己对训令的理解将它浓缩为12条，其内容包括：释放被中国俘虏的哥萨克官兵；中国派使团携带宝石、金银、绸缎等赴俄“报聘”；中国每年向俄国输出白银4000普特及各种宝石；俄商得在中国各地自由贸易；等等。由于这一时期沙皇政府刚刚镇压了斯杰潘·拉辛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国库十分空虚，同时由于第三次英荷战争的影响，俄国同西欧的贸易额日益缩小，因而促使沙皇政府急需扩大中国市场，以增加国库收入。所以，斯帕法里忠实地依照训令，把经济贸易往来摆在了重要位置。然而，照会中对清政府多次提出要求俄国停止领土侵略、引渡根特木尔等问题却只字不提。不难看出，沙皇政府，包括直接担负外交使命的斯帕法里，对清政府提出的两项改善中俄关系的根本性问题完全采取了拒绝的态度。

尽管斯帕法里蛮不讲理、顽固不化，但是清政府还是给予了他应有的礼遇。6月15日，康熙帝召见了斯帕法里，并赐茶给他，此后，又两次邀请斯帕法里及其随员入宫参加御宴，并曾五次赐宴于使团下榻的宾馆。

8月9日，斯帕法里得到了清政府的最后答复。清政府再次重申了希望俄国停止侵略活动、保持边境安宁和引渡根特木尔的要求，并针对斯帕法里蛮横顽固的外交态度，要求俄国如果再派使者来必须是通情达理的人。清政府最后表示，如果上述三点俄国不能履行，斯帕法里提出的照会自然无法作答。斯帕法里使团站在沙俄扩张主义立场上的外交活动理所当然地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谈判既无结果，斯帕法里使团已无事可做，于是于9月1日，携带着康熙帝赠给沙皇的鞍具、银质水罐、绸缎、兽皮、茶叶等礼品，分乘60辆大车离开北京回国。

这次出使虽未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这是沙皇政府同清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开端，其意义不可低估。同时，使团对中国的城乡概貌、经济、地理、民俗、商业、军事等方面做了一次综合性的实地考察，取得了宝贵的资料。这些资料和谈判经验很有价值，为后来的俄国外交官员广泛利用。而斯帕法里本人作为沙皇政府派出的使臣，面对闭关锁国、顽固守旧的清政府这个谈判对手，也可谓不辱使命、尽职尽责了。

斯帕法里在北京期间，还同西方国家在华的耶稣会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他对这些耶稣会士百般笼络，从他们那里事先了解了清政府对俄国的基本态度和谈判对策。这些耶稣会士也乐得为他出谋划策，传递信息。特别是在

清廷任钦天监监正及译员的南怀仁，与斯帕法里更是过从甚密，他曾把私绘的中国地图送给斯帕法里，并把清政府在黑龙江地区的战略计划用拉丁语密告斯帕法里。斯帕法里的头脑远远胜过他前几任出使北京的同行，开创了收买耶稣会士为其政府服务的先河，此后再来华的俄国人无不争相效尤。

斯帕法里出国期间，沙皇逝世，皇太子费奥多尔继位，斯帕法里的靠山、大贵族 A. 马特维耶夫因失宠于新沙皇而被削爵流放。斯特法里回到俄国后即受株连，两年之后才回到外务衙门任职，并补受了沙皇对他出使中国的奖赏。1681 年，斯帕法里曾被任命为捷姆尼科夫市督军，1695 年参加了彼得一世的亚速夫远征，1678~1683 年间曾参加了由 A. 维尼乌斯主持编绘俄国地图的工作。他与另两位翻译拉夫连季·格罗斯和谢苗·拉夫列茨基还得到了沙皇的特殊恩典，即在沃洛格达县和雅罗斯拉夫尔县“拨给他们三人每人二十家农户，人数不减，以免其妻孥漂泊人间，俾使其子嗣能够在某一方面为大君主效力”。

斯帕法里死后葬于何处，无任何记载，可能葬于他长期供职的莫斯科，也可能葬于佩列亚斯拉夫尔—扎列斯基，因为他在那里为其儿子尼基塔和马克西姆购买了一块拥有 11 家农户的世袭领地。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斯帕斯基大门上镌有一块拉丁文题词和一块俄文题词，题词系斯帕法里所译，这成为他永久性的纪念。在太平洋上有一个名为斯帕法里的小岛，是为纪念他的后代之一——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斯帕法里耶夫（1766~1847）而命名的。

三 四部关于中国的重要书稿

斯帕法里由于自幼受过良好的多方面的教育，又通晓多种语言，并曾周游欧洲列国名城，尤其是出使过被欧洲人认为十分遥远而又神秘的东方古国——中国，因此成为一位学识广博、阅历丰富的人。他的一生虽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但也编撰了相当数量的著述。早在任乔治·吉卡驻君士坦丁堡代表时，他就曾将《圣经》从希腊文译成摩尔达维亚文，可惜这部译著未能保存下来。有材料记载说，斯帕法里被其流亡主人乔治·斯特凡派驻斯德哥尔摩时，曾编写过一部罗马尼亚的编年史，根据他的学识和对历史的爱好来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因未见到有人读过或收藏过这部编年史的手稿或抄本的记载，因此还无法断言是否真有其事。其间，他还为法国驻斯德哥尔摩的使臣阿尔诺·戴·波旁编了一本《指南》。

斯帕法里在莫斯科外务衙门供职期间是他一生写作活动的高潮，因为

“编书”是当时外务衙门的职能之一，安定的生活环境和优越的工作条件使他如鱼得水。1671~1674年短短的几年里，他独自或与人合写了《数论》、《圣徒传》、《米哈依尔·费多洛维奇统治时代的选举与加冕礼》、《缪斯，或七门自由科学》、《女先知书》、《列王纪》、《论女巫师》、《俄国沙皇世系》、《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教堂介绍》等著作。他编的《国家书》颇得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赏识，沙皇不但本人看，还指示皇太子费奥多尔·阿列克耶维奇阅读。斯帕法里还编纂过一部《希腊—斯拉夫—拉丁语辞典》。孜孜不倦的写作使他获得了特设的文学奖，并于1674年末获得了沙皇赐给的50卢布貂皮的奖赏。

斯帕法里的博学和献身精神，被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看中，而委任为沙皇政府的使臣派往中国。斯帕法里不同于过去到过中国的俄商或军役人员，他作为国家级的使臣，除了展示他的外交才能之外，又发挥了他作为学者的特长，以其出色的洞察力和勤奋的手笔，将这个在人种、宗教、习俗等各方面与西方大相径庭的国度沿途的所见所闻无一不详细记载，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文字材料。斯帕法里返回莫斯科后，向外务衙门呈交了四部书籍的手稿和一部有关从莫斯科到北京的主要道路的《总示意图》。这四部手稿第一部是《中国纪》，即《出使报告》，介绍由中国边境到北京的旅程以及在北京期间的情况。第二部是《旅途日记》，记载从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尼布楚）沿途情况。第三部是《中国纪事》，这部书共59章，附有译自卫匡国的《鞑靼纪》。第四部是《单独图册》，这个图册和前述《总示意图》在斯帕法里呈给外务衙门的全部材料中至今无人见过，有人估计所谓《单独图册》是斯帕法里绘制的从托博尔斯克到北京的路线图册。

斯帕法里使团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不亚于一支科学考察队。他集中了各种人才的智慧，详尽地搜集了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地区通向中国的几条道路，中国东北和京城以及与中国相邻各国的最新鲜、最翔实也是俄国最急于知道的情报。沿途凡是值得注意的事情，他都不失时机地做了忠实的记载。诸如河流、岛屿、丛山、旷野、森林、飞禽、走兽、游鱼，俄国人、中国人、土著人种什么作物、开什么矿、信什么神、受谁的统治、政敌是谁等等，事无巨细，无所不包。仅沿安加拉河一条河，他所观察并记录下来的事物即达数百项之多。他从事的事业可称为开拓性的，他获得的这些材料对于俄国来说无疑是十分珍贵的，所以被作为机密保存下来，长期未得出版。

斯帕法里的出使在欧洲各国也引起反响，他的手稿引起了各国朝野人士的兴趣。早在17世纪80年代末，法国耶稣会士阿弗里尔就曾在莫斯科查

阅过这些手稿，并将其中许多资料和地图发表在自己的著作中。荷兰学者也将《中国纪事》中《阿穆尔大河的传说》一章译成荷兰文发表。耶路撒冷总主教多西费伊曾于1693年专程派其侄子、圣格罗布斯克修士司祭赫里桑夫前往莫斯科，命他组织翻译斯帕法里的《旅途日记》。在斯帕法里的亲自指导下，几名翻译经过艰苦工作，将它译成了希腊文。这个希腊文译本的抄本分别收藏在君士坦丁堡和巴黎等地，乔治·西翁又根据这个抄本翻译成罗马尼亚文，并于1889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此外，在德国柏林也发现过17世纪末由斯帕法里绘制的亚洲和俄国欧洲部分的地图。总之，斯帕法里的几种著作，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各国广为流传，使欧洲人获得了不少关于中国——这个遥远国度的第一手资料。

尽管斯帕法里的著作早已在欧洲以各种文字流传，但在俄国却被封锁了将近两个世纪。直到1853年，《阿穆尔大河的传说》的缩写本才由Т. И. 斯帕斯基首次发表，而且还略去了斯帕法里的名字。到1882年，由Ю. В. 阿尔谢尼耶夫出版的全文才署上了原作者名。19世纪末，这部著作又在莫斯科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两次发表。斯帕法里的《旅途日记》和出使中国的其他手稿在外交部莫斯科总档案馆里足足被封存了两个世纪，直到1882年，才由Ю. В. 阿尔谢尼耶夫发表在圣彼得堡的《俄国地理学会会刊·民族志部》第10卷第1期上。1906年，Ю. В. 阿尔谢尼耶夫又根据收藏在外交部莫斯科总档案馆（现藏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的原本，发表了斯帕法里的《出使报告》。但发表时删去了西伯利亚旅途的那一部分，因为这些记载在《旅途日记》中已有详细的反映，此外在《旅途日记》中已收有的斯帕法里的《奏疏》也未收入。

斯帕法里最重要的著作《中国纪事》在17-18世纪有众多的抄本流传，仅Н. И. 齐默尔便发现这部著作的抄本有36种，而其最后一章——《阿穆尔大河的传说》的抄本竟多达50种。这些抄本分藏于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圣彼得堡古文献爱好者学会、喀山大学、莫斯科大学历史与俄国古物学会图书馆、外交部莫斯科总档案馆等处，但原本至今是否尚存且藏于何处则不得而知。对斯帕法里的著作做过校订工作的Н. Ф. 卡塔诺夫于1910年在喀山出版了这部著作较为完整的版本，他根据的是喀山Ф. Т. 瓦西里耶夫所藏的抄本。1910年的这个版本是以古教会斯拉夫文体印刷的，装帧精美，价格昂贵。

直到20世纪50和60年代，苏联和罗马尼亚仍在编辑出版斯帕法里的著作。